

南方學院學術叢書第五種

本土与中国

學術論文集



安焕然 著

南方学院出版社

南方学院学术丛书第五种

本土与中国：学术论文集

安焕然 著

本书获得“南院萧畹香学术基金补助计划”评审委员推荐，
并由该基金资助出版。

南方学院出版社

2003年8月

南方学院学术丛书第五种
本土与中国：学术论文集

作 者： 安焕然

出 版 者： 南方学院出版社

Kolej Selatan

PTD64888, 15km, Jalan Skudai, P.O.Box 76,
81300 Skudai, Johor, Malaysia.

Tel: 07-5586605 / Fax: 07-5563306

出版经费赞助： 南院萧畹香学术基金补助计划资助出版

封 面 题 字： 大原美智

承 印 者： 康德有限公司

8, Jalan Rosmerah 1/4,

Taman Johor Jaya, 81100 Johor Bahru.

出 版 日 期： 2003年8月

定 价： RM15.00



安焕然，1968 年出生于柔佛哥打丁宜，新山宽柔中学毕业，台湾成功大学历史语言研究所硕士，现为南方学院学术研究主任、中文系讲师、搜集柔佛潮州人史料合作计划执行主任，亦是报社专栏作者。

自 • 序

感谢南院萧畹香学术基金补助计划及南院出版社给了我一次回顾自己十年有余以来的学术历程，并藉以整理自己学术寻索之路的机会。

这是我的第一本学术论文集。为了尽可能体现我的学术研究的历程，论文的排列是以发表的年限为准，并且尽量不作修改（除了一些打印上的错别字），尽量保留它们的原貌。当然，这无可避免的将出现文章水准不一，甚至观点前後矛盾的地方。从文末标明了原刊发表的日期，读者们不难读出其中的变化。

本书所收的十六篇学术论文是本人从1991年至2002年十余年来从事学术研究的小小总结。文章大部分原载於国内外的学术刊物。其中有3篇是原刊载在台湾，包括《国立编译馆馆刊》、《道教学探索》及《文学台湾》；马来西亚华社研究中心出版的《人文杂志》（2篇）、《资料与研究》（4篇）、华总《愿景文化季刊》（2篇），以及其他特刊（2篇）。此外，另有3篇是出席北京、台湾及新加坡所主办的国际学术研究会上所发表宣读的论文，合计共16篇。

〈浅谈新马的大伯公信仰〉和〈从华侨一词的源起詮译看海外华人的华侨性格〉二文是大学时代的作品，收录於此，仅带有“记念”性质。

〈殖民统治下所形成的两个文学特区〉、〈宋元海洋事业的勃兴与妈祖信仰形成发展的关系〉、〈从西方移情中国〉、〈反的制衡与反的失落〉、〈台湾本土论述与台湾文学之研究〉、〈内在中国与乡土情怀的交杂〉是就读研究所时期及1995年返马初期的作品。这时期的撰述量颇大。

〈跃进中的南方学院〉仅是初来南院，应新山中华公会出版特刊之邀，所写的一篇介绍性文章。〈华教运动与华校素质〉和〈论马来西亚国家发展过程中的华人文化〉则是比较宏观性论著。〈论满刺加与中国明朝的建交〉、〈满刺加国王皈依伊斯兰教与郑和下西洋〉则是我的硕士论文的其中一个章节之改写。〈新山地方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及〈马来西亚柔佛潮人的开垦与拓殖〉二文则是最近的作品，并获得学术界点名肯定，也是我比较满意的作品。

大致说来，在成功大学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时候，我主要受教於陈信雄师及郑永常师，主攻中国海洋史。而在这过程中，由於对妈祖信仰与海洋事业的关系产生兴趣，也稍有涉猎。林瑞明师对台湾文学史研究及其热诚，对我的影响亦很深。政治大学民族所林修澈师，则是我的思想启蒙老师。此外，又曾在成大政治经济研究所宋镇照师的指导下，担任研究助理，从事东南亚国家机关的研究。然而，十年有余的学术撰述，我最初是搞中国海洋史的，後來渐走向(马来西亚)本土研究；我最初是“无知”的做宏观的政经分析，如今却走向了微观的本土地方史研究，从事口述历史及田野调查。不论这样的学术转向是否正确，路仍是要走下去的。

最後，还是要衷心地感谢南院萧畹香学术基金补助计划赞助这本书的出版。

安焕然志於2003年8月1日

目次

○ 自序·····	IV
○ 浅谈新马的大伯公信仰·····	1
○ 从“华侨”一词的源起诠释看海外华人的华侨性格·····	17
○ 殖民统治下所形成的两个文学特区—— 论台湾文学和马华文学的源起发展与中国新文学运动之关系·····	47
○ 宋元海洋事业的勃兴与妈祖信仰形成发展的关系·····	66
○ 宋元明清敕封妈祖事因类型与历朝海洋事业发展之“官民关系” 的探讨·····	135
○ 从西方移情中国——评 Paul A. Cohen 的 《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	192
○ “反”的制衡与“反”的失落—— 大马社会与国家机关互动关系之探讨·····	207
○ 台湾本土论述与台湾文学之研究·····	224
○ 内在中国与乡土情怀的交杂—— 试论大马旅台知识群的乡土认同意识·····	239
○ 跃进中的南方学院·····	302
○ 华教运动与华校素质·····	321
○ 论满刺加与中国明朝的建交·····	333
○ 论马来西亚国家发展过程中的华人文化·····	350
○ 满刺加国王皈依伊斯兰教与郑和下西洋·····	371
○ 新山地方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377
○ 马来西亚柔佛潮人的开垦与拓殖—— 以“搜集柔佛潮人史料合作计划”成果论述·····	411

浅谈新马的大伯公信仰

一、缘起：四、五十年代的微笑

新马一带，常被人喻为是“文化沙漠”，笔者在马来西亚时也深有此感。惟近来阅读东南亚华人史的资料，不觉惊讶，在40、50年代的新马，曾有过一批人，凭著一股傻劲，默默地从事东南亚史的研究工作，其中尤以1940年组织的南洋学会（随之出版《南洋学报》）最为积极。南洋学会是个纯粹以研究学术为目的团体，没有任何政府或大机构作为后盾。经济不足时，只赖社会人士捐献，编辑人员都是义务性质。其中，许云樵、韩槐准、陈育崧等则是该学会历史上最突出的人物¹。当年，他们以韩槐准居屋“愚趣斋”作为学术交流的中心，陈育崧如此说道：“愚趣园中，沈阴底下，畅啖红毛五月丹，甘美清冽，直透肺腑，烦暑盡滌，主人又出所藏之唐宋元明清陶瓷器皿、珍品碎片，什然前陈，大谈其南洋陶瓷史，而华僑史，而大伯公考，高谈闊論，旁若無人，這是南洋學會仝人的風趣。十幾年來，白雲蒼狗，風風雨雨，都打不斷我們這股傻氣”²。那是一段四、五十年代的微笑，令人钦慕不已。如今此三人先後已归道山，南洋史研究似显断层，不禁又令人无限感慨。而南洋学会诸位前辈默默耕耘的“傻劲”，身在台湾的我，不由自主

的对他们深表敬意。惟此，把四、五十年代的诸前辈曾热烈讨论过的其中一个话题——大伯公信仰，在此做一综合性的浅论，试把这过去的研究成果再次浮现出来，这是本文之缘起所在。

二、众说纷纭的大伯公

大伯公是东南亚，尤其是新马华人社会中特有的神祇，流传甚古，被普遍的奉祀。但其来历如何，却颇不清楚，在中国的宗教典籍中也可能查不到。关于其来源，40、50年代初期，南洋的学者曾经热烈的讨论过，甚至进行了学术论战，如韩槐准与邝国祥等。在香港的著名考古学家卫聚贤亦加入了讨论，最后，许云樵的〈大伯公、二伯公与本头公〉（《南洋学报》第七卷二辑，1951年2月）和〈再谈大伯公研究〉（《南洋学报》八卷二辑，1952年2月）二篇文章，可算是做了综合性论述，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2.1 “开山大伯张理”说：

最早提出此一问题的是1879年，英国官员J. D. Vanghan在其The Manners and Customs of the Chinese in Straits Settlements一书中说大伯公庙是祠事天地会之魁杰，遭逃南洋者张理。关楚公在《星洲日报》半月刊二期〈谈谈大伯公〉一文，引用了J. D. Vanghan的话，并论断大伯公可能原是洪门会党内的一种最高职位，而拜大伯公³。

接著，陈达博士在其著名的《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一书的第

九章〈信仰〉条中，似引用上说，并根据槟城海珠屿大伯公庙的碑文一节及某华侨的口述，认为大伯公是嘉应五属人所特别崇拜的神祇。其来源乃是咸丰年间，有一年疫疔流行病盛行，死了很多人，唯独嘉应五属出身的马某（烧炭工人）、张某（塾师）、丘某（铁匠）不死，而被尊称为“开山大伯”，后人追其功德而立庙奉祀⁴。但陈达又觉得大伯公与土地神祭祀的起源有关，认为大伯公其实就是当年夏禹命令去开辟土地，使民有居的“伯益”⁵。

此外，邝国祥亦同样根据槟城海珠屿大伯公庙的历史，认为大伯公是由潮东的土地神演变而来，而海珠屿大伯公庙其神即客籍人士，且断定张理是“开山地主”，最先被祀为神者⁶，并撰〈槟榔屿海珠屿大伯公庙重修碑记〉，认为该庙建于嘉庆四年（1799）⁷。

然而，邝国祥的说法只是传说，缺乏有力证据支持，而以张理说为大伯公者，亦似仅是根据槟城海珠屿大伯公庙的特例，且参杂了秘密帮会私会党的神秘附会色彩，在新马其他地区的大伯公庙并无此说。故大伯公并不一定专指张理。至于陈达的伯益说，其论断亦缺佐证。但可以肯定的是，大伯公与土地神有著相当密切的关系。

2.2 韩槐准的“都纲水神”说：

最先提出大伯公即由水神演变而来的独到见解者，是韩槐准。他以宋赵汝适《诸蕃志》〈卷下·海南条〉、明谢在杭《五杂俎》〈卷十五事部〉、明张燮《东西洋考》〈卷九祭祀条〉和《图书集成职方典》〈卷一三八零·昭应祠〉等所述的“舶主都纲庙”、

“拏公”、“都公”、“番神庙”等水神称谓，以马来话Tokong的对音法来配合，认为大伯公名称之由来，“或因前人视舶主都纲，或都公，或拏公，或托公，其性质实质等於番土地神。因土地神之庙多名为福德祠之故，後因大伯公已锐变为土地神，故星嘉坡凡有华人公共坟茔之场所，必设一大伯公庙，可谓一变而再变”⁸。另外，《中山传信录》及《使琉球记》中，亦发现“拏公”的记载，而且往往是远洋船只上与天后娘娘（天妃）所一同共祀的神祇，因而对之得到佐证⁹。故韩槐准认为大伯公为水神舶主都纲（而这舶主可能是一位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商人），只是後来逐渐转化，才演变成今天的土地神信仰。

其从水神渐演变成土地神（或番土地神）的信仰之论断，是配合新马早期华人移民社会而论的。而之後，韩槐准一直执著这一论断。

2.3 吴太伯、二伯说：

当时远在香港的著名考古学家卫聚贤亦参与了讨论。他以石钺、印纹陶的考古材料，典籍中《庄子》“鸛鹑”以及传说中的材料，论说东南亚土著人种原是吴民族。而在《南国少年》第二号〈中国古代与南洋的关系〉一文中认为大伯公庙就是南洋土人为著纪念他们的祖先而建筑的庙。认为大伯公就是当年的吴太伯，并提出了二伯公（即仲雍）一说，且认为“南洋各地，凡是有华侨的地方，都有大伯公，二伯公庙”¹⁰。

然而，卫聚贤虽是中国鼎鼎有名的考古学家，但对东南亚的历史与实际状况似有隔膜，以致对大伯公过度臆断，而二伯公一说，更是在当时热烈的学术讨论，制造出了一个笑话。因为“二伯公庙”仅是香港筲箕湾鲗鱼涌附近的一庙宇，只是特例。新马，甚至东南亚一带根本没有什么二伯公¹¹。这论说，许云樵曾多次为文，给以谐谑的批驳¹²。

2.4 许云樵的综合性论说：

在热烈的讨论过程中，许云樵的〈大伯公、二伯公与本头公〉及〈再谈大伯公研究〉等文章，可算提出了较为综合性的论述。对以上所述，各有批驳，亦有他自己的看法。

许云樵认为，大伯公就是中国的土地公。其理由有三：

- (1) 南洋各地奉祀大伯公的庙叫做福德祠，中国的土地庙也叫做福德祠。在此，笔者亦引几条庙碑以佐证许氏的说法，例如：1847年，道光廿七年丁未〈峨槽大伯公庙碑〉：“峨槽大伯公，显赫灵感，扩国庇民，神恩浩荡，黎庶治泽，原自昔年，有福德堂古庙，历年以久”¹³。1869年，同治八年己巳，〈海唇福德祠碑〉：“尝思美於前者，固宜美於後，成於始者，尤贵成於终，兹我大伯公之有此祠也”¹⁴。
- (2) 土地公是到处必有的。而且一个地方可能有好几间土地公庙，不比城隍庙，一县只能有一座。大伯公庙也是如此，在新加坡只有一座城隍庙（在柏城街），却有十几间大伯公庙，可是并没有一间土地庙。

- (3) 广东客家人称土地公为“伯公”，“大”字只是尊称。故大伯公就是中国的土地公¹⁵。

土地公的崇拜，是因地因时因人而异的。在闽粤一带，土地庙、土地公称福德祠，福德正神，在客家区域及潮州也有呼作“伯公”，福建惠安亦有称赵玄坛为大伯公，而大伯公并不去指某一人，如同Dr. Victor Purcell在其《东南亚之华侨》(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所说的一样：“大伯公在海外华人中是最受人望的神，但在中国宗教典籍中却可能查不到祂……(大伯公)似乎是华侨将先驱者的精神予以笼统地神格化”¹⁶。是华人先驱者的象徵。因此许云樵虽认为大伯公就是土地公，但却又认为大伯公是早期南洋华人将黑虎赵玄坛、姜太公、灶君、水神船主都纲以及土地神等，祈求平安和发财的神祇们的混合象徵¹⁷。

另外，许云樵认为大伯公最初应是由客家的土地神演变而来的。此乃由於客家人最先在矿区奉祀土地神，称为伯公，後来和马来语Dato一词连称，而作Topekong，才变成大伯公¹⁸。而後才又逐渐演变成又像姜太公，又似赵玄坛，而才和中国的土地公有些不同。

三、大伯公信仰的一般情形

虽然，对大伯公的来历，众说纷纭，然而大伯公却是新马一带相当普遍崇拜的神祇。

3.1 因地因时因人而异的大伯公：

如前所述的，大伯公并非专指一人，大伯公的人选往往因地而异。在槟城私会党，大伯公被奉为是开山祖师张理。韩槐准说大伯公是舶主都纳，而在婆罗洲的坤甸，大伯公被认为是罗芳伯。在泰国，没有大伯公，而有本头公，例如曼谷的本头公庙，传说是水浒传中的浪子燕青。在苏禄也有本头公，据说是当年郑和的一位姓白的部下流落在南洋的¹⁹。而在印尼椰加达的大伯公庙，却还有个大伯婆伴随。该庙的大伯公据说是郑和下西洋的一个士兵，死後显灵为神。大伯婆则是该士兵流落在爪哇时所讨的番妇。新加坡的龟屿的大伯公庙，供奉的也是一对老夫妇。大伯婆是中国老婆婆，但是他们所领养的一个养子却是马来神童，可见他们已经马来化了²⁰。此外，凡居多猛虎之逼的，乃呼猛虎为伯公，凡居多鳄鱼之处，乃呼鳄鱼为伯公，而且甚至有把身有五点黑色标记的竹筴鱼(Chorinemus, 马来话为Ikan Talang)亦俗呼为伯公，不敢当膳之禁忌²¹。而其他各地所拜的大伯公，也大都不知道是谁，故大伯公笼统的认为，应是早期华人先驱者精神的象徵之崇拜。如兹说，或许较为贴確，是新马或东南亚一带华人所特有的神祇之一，但并不像崇拜三宝公郑和一样，专指某一入。

3.2 大伯公的神能

如同许云樵所说，大伯公是祈求平安和发财的神祇们的混合象徵。因此他所具备的神能性质，似乎又比一般的土地公多，而且亦

已“本土化”了。“大伯公托廊”(Topekong Tolong)成了信仰大伯公的星马华人的口头禅。“Tolong”其实是马来话“保佑”的意思。因此呼“Topekong Tolong”，可发财，可愈病，可风平浪静，可转危为安²²。

与中国(或台湾)土地公所不同的是，在中国的土地公是不能进入家宅，有坛无屋。但是新马所奉的大伯公(或土地公)却是进入民屋，供奉在家里，且安放在香案底下，犹如宅神，这种情形极为普遍。与丁煌老师讨论的结果，丁老师认为把土地公供奉在家里，可能是更古老，更传统的土地公习俗，反而是台湾等地变质了。总之，不论是谁变质，新马的大伯公与中国的土地公虽有很多相似之处，但亦有少许的异质性。唯大抵不脱离祈求平安、祈求风平浪静、治病、除灾、发财、管理土地等神能，以马来话“Topekong Tolong”或“伯公Tolong”，为口头禅，而且可以供奉在家里。

另外，马来人的精灵崇拜(Kramat, 圣地之神)，即“那督公”，“那督”为马来话Dato的译音。大多以土蚁窠、树根、大岩石为对象，许云樵认为应是由马来人习俗蜕化而来，和大伯公的性质应该不相同²³。

3.3 大伯公崇拜与新马早期华人社会

早期新马华人移民群体的社会结构，基本上是建立在“帮”的基础上，以操共同方言的人，凝聚而成若干不同的社会集团或是秘密社会，而带“帮派主义”的色彩。而他们帮派成员之间的交流聚

会之处，往往是众义冢、宗祠或神宫等宗教性结社演变而来²⁴。後才逐渐形成会馆等形式。而大伯公以其土地神或水神或私会党守护神等性质，自然很早就与华人移民社会有着密切的关系。透过大伯公庙，对早期华人移民社会的历史性质的了解，实有很大帮助。

3.3a 檳城海珠屿大伯公庙

檳城最早的大伯公庙是海珠屿大伯公庙。邝国祥在“海珠大伯公庙重修碑记”里说它创建於1799年。但其说法缺乏有力证据支持。但据谓原在庙前古榕树下找到的一个香炉，上刻有“乾隆壬子，六甲弟子李赐答谢，葭月吉日立”的文字。乾隆壬子即1792年（乾隆五七年），为檳城开辟（1786）後的七年，而“六甲弟子李赐”之“六甲”应是指今马六甲，故李赐乃自马六甲来檳城者²⁵。可窥出，早期檳城的华人移民，很可能相当大的部分是由历史发展较早的马六甲华人移民过去的。

另外，在海珠屿有“永定福春马府君墓”、“嘉庆十四年（即1809年）春月立碑”，如第一节（一）所说，这是嘉应五属人的“开山大伯”张某丘某马某中的“马某”之墓。因而，才可能会有以天地会魁杰张理为大伯公的传说出现。况且在19世纪中期，檳城的华人，其中近五分之四都是会党成员²⁶，可推测海珠屿大伯公庙可能与当时早期华人移民的结构组织私会党有着密切的关系。

至1810年，客家人在檳城市中心的大伯公街建立了“福德祠”；它成为客家五属人的活动中心。每年二月十五日，客家人都恭送

这里的福德正神驾往海珠屿正庙，隔天便在那里庆祝大伯公诞辰，到二月十七日上午再迎接福德尊神驾返市区的分祠。可见大伯公与土地公的关系，以及与客家帮凝聚的精神信仰关系。

3.3b 新加坡恒山亭

大伯公不仅只有客家人供奉，其他方言群亦奉之，建立於道光八年(1828)的恒山亭，座落在新加坡kampung Bahru的一座小山丘上，恒山原为早期福建人的公共坟场，恒山亭是福建人进行丧葬祭奠的祠庙。庙里供奉的主神是福德正神（俗称大伯公），其左侧是城隍爷公，右侧是注生娘娘²⁷。而1830年(道光十年庚寅)的“薛文舟立恒山亭”碑中所例的捐献人名单如薛佛记等，大都是福建帮人士。而薛佛记原籍漳州东山，原是马六甲富商，故亦可知马六甲与星加坡华人移民之间实存在着相当大的流动性²⁸。这对研究早期的新马华人移民史有很大的启示。

3.3c 私会党的大伯公会

1847年漳泉人在檳城创立“建德堂”，是以膜拜大伯公为纽带的一个从事械斗的秘密会社，而被一般人称为“大伯公会”。会内设有炉主，负责埋葬及祭祀无亲无故的党员。当时漳泉豪族藉著“大伯公”的威灵号令福建人，以便和以关帝爷为守护神的广东人的义兴公司对抗。1890年英殖民政府取缔，而组织了“宝福社”来照顾建德堂所奉祀的“大伯公”，每年农历正月十五日，亦送大伯